·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

DOI:10.20004/j.cnki.ujn.2024.06.003

中华传统文化的张力:基础、结构与特质

马爱菊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浙学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中华传统文化的张力产生于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脉络中,充分辨析中华传统文化的张力是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深化对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及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文明的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张力的基础源于中华文明是连续的、有机的、开放的整体系统;中华传统文化在交流碰撞中,形成了"统一与多样""核心与边缘""内部与外部"的张力结构;中华传统文化张力的特质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底色。中华传统文化的张力具有两面性,在创新活化过程中,只有将张力内化为发展动力,才能破解传统文化传承局限,推动文化自身的新发展、新飞跃。

[关键词]文化自信;中华传统文化;张力;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4)06-0031-07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论学术界渐达共识,而对于如何传承、如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学者们见仁见智。笔者以为,探讨中华传统文化的张力是文化研究至关重要的前提、基础,亦是承续文化血脉、推动文化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文明的现实需要。"张力"是物理学常见术语,是指某一物体在受到外在拉力作用时,存在于物体内部的一种牵引力。张力的产生首先以事物或者对象具有整体性为前提,即张力产生于一个整体中;其次,这一整体须由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因素构成,且各个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如果事物或对象是孤立的、闭塞的,那么张力就无从谈起;再次,张力的产生还要满足事物或对象是持续存在的,如果事物或对象发生断裂、消亡,那么张力也就随之消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张力是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能与其他文化文明共生共存、互鉴共荣的稳定性结构,使中华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发生对抗对立的同时,能够相协相融,具有可塑性、延展性的鲜明特征。

一、中华传统文化张力的基础:中华文明是连续的、有机的、开放的整体系统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基石。中华文明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闭塞的,而是连续的、有机的、开放的整体系统,连续性、整体性、开放性特征恰恰是中华传统文化张力产生的基础。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首先表现在时间上的连续性。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历程,自三代文明奠基以后,便一脉相承、源流清晰: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考据学绵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清代儒家'慎独'观念的哲学诠释研究"(项目编号:24NDQN183YBM)。

[作者简介]马爱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哲学博士,邮箱:905991080@qq.com。

延不绝且各呈风流。而中华文明以外的文明,例如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以两河流域为代表的古代西亚文明和以玛雅文化为代表的古代中美洲文明,或受外来文明的影响或因文明自身不稳定等原因,均中断或消亡了。唯有中华文明,虽也历经劫难,但是其语言文字是连续不断的,其文化传统及人文精神仍是一脉相承的。时至今日,中华文明依然充满生机和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①]我们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明白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除却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优渥的自然环境因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华文明具有绵长不断的历史传统和超稳定的内部结构。中国自古即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伦理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宗法制度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儒家尤为重视"亲亲""尊尊""长长"等伦常秩序,在其影响下传统社会形成了以血缘亲情关系为纽带、以人伦化的社会关系为核心、以伦理共同体为基本单元的结构形态:"由家庭—家族—国家构成的社会关系结构,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由此'家'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秩序的基础,而且构成了社会精神文化的堡垒。"[②]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中华文明传承过程中,血缘亲族形成了超稳定的内部结构,极大程度上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土壤。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仅是时间上的连续性,更是空间上的连续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天—人—地"的空间结构。与西方哲学传统不同,中国文化认为"天人合一",即天和人不是孤立的,二者是相即不离的关系。先秦诸子对"天人合一"思想多有诠释,道家认为"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③],"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④]。人与自然息息相关,天地扮演着父母的角色。儒家学说不仅认为人与万物都是由天地生成的,还将这一思想与人的道德联系起来。例如《易经》将天、地、人并列,这就凸显了人的重要性,天、地、人三才虽各有其道,但彼此间又是相互联系的,三才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路径,也寄寓着人与天地、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易经》并进一步说:"立天之道曰阴阳,立地之道曰柔刚,立人之道曰仁义。"[⑤]将天地与人的道德相联系,意在说明人与天地形成了一个整体,一个天人合德的整体。至宋明时期,朱熹指出:"天人本只一理,若理会得此意,则天何尝大,人何尝小也……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⑥]对于朱熹的这一观点,蒙培元先生认为,"天人合一"是朱熹哲学的终极命题,从本体论和发生论同时论证了人和自然界的统一。[⑦]可以说,"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贯穿了整个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也是中华文明整体性特质以及中国人整体性思维的力证,如宋代大儒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主张,认为人和物都由天地所生,天下的人都是同胞,天地间的物和我(人)都是同伴,这其中就蕴含着天人合一、万物同体的博爱精神。同样,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⑧]讲的是志士仁人要拥有胸怀天下的大格局,同样彰显了中

①《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第1版。

②赵庆杰:《家庭与伦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页。

③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27页。

④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477页。

⑤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76页。

⑥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7页。

⑦蒙培元:《朱熹哲学的终极命题——"天人合一"》,《朱子学刊》(第1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70页。

⑧章锡琛点校:《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76页。

国人的价值信念及整体性思维方式。

此外,中华传统文化的张力还在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中华民族以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①]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整体性与开放性彰显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华传统文化张力产生与延续的基础与保证;这也意味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张力具有时代性与多样性,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审视中华传统文化,以整体性思维全面审视史实、辨析聚力的产生因素以及各张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思考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力求化文化张力为自身发展的原动力。

二、中华传统文化张力的结构:“统一与多样”“核心与边缘”“内部与外部”

纵观数千年历史,对外开放、文化交流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鲜明特征。在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中华传统文化内部形成了“统一与多样”“核心与边缘”“内部与外部”的张力结构。

中华传统文化张力结构之一是“统一与多样”。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梁启超提出“多元混合说”,认为中华民族并非只有一个民族,而是由多个民族混合而成。中华各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成就了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费孝通曾提出“多元一体”论,“多元一体”即各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二者互相融通,互相促进。“多元”组合成“一体”,不仅指各民族汇聚而成中华民族,还指各民族的多元文化在交流互鉴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趋于相同的思维模式以及精神气质;“一体”包含了“多元”,在文化方面,强调的是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依然保持本民族个性。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多地考古调查发掘和综合研究均可力证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由多元逐步演变为一体的过程,各种文化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最终融合汇聚成灿烂的中华文明。缘此,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上,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统一与多样互鉴、共性与个性共存的灿烂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促成了其张力的空间结构。中华传统文化“统一与多样”的张力不仅存在于各民族之间,还表现在地域空间上。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是不一样的,如《诗经·国风》汇编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十五个诸侯国地区的民歌,这些分散在各区域的文化,如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燕文化等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元的中华文化版图。各地域文化通过多种形式不断交流得以丰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②]一方面,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可以增强民族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关键:“中华各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形成了相对可以兼容的心理、思想与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民族性格,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形成了共同的信仰信念,这是维系协调各民族的润滑剂、自强不息的源动力。”[③]另一方面,在各民族、各地域文化交涉过程中,风俗习惯、主流价值观、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容置疑会存在差异甚至是矛盾冲突。然而,各民族、各地域文化内部本身存有相同或相近的有益于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价值理念,这就使得中华传统文化中“统一与多样”的张力势均存在。

①卜宪群,梁仁志:《从中国历史看对外开放》,《红旗文稿》,2020年第7期。

②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2月1日第1版。

③郭齐勇:《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页。

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与边缘”的张力结构,主要表现在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学说的关系上。以儒、释、道三家学说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演进中,儒、释、道三家学说隐现出了文化主旨、价值追求、修养途径等方面的张力。儒家《大学》提出“三纲八目”①,“三纲”即“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即“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蕴含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又以“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②为使命,追求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的不可分割。道家认为“道”是万事万物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③追求“万物一府,死生同状”④的自由境界。佛家主张万法皆空。儒、道、释各成体系,博大精深,三者共同塑造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部分,均有引导人们生活实践的功能,增进了人类文明理论,丰富了人类文明成果。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文化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三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⑤道教学说以及佛教的传入并未使儒家文化消亡,相反,儒、释、道三家相互借鉴、融会贯通,推动了彼此的新发展,而长期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格局,终使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核心与边缘”的张力结构。

中华传统文化在进行自我批判的同时,面对着外来文化的冲击和选择,其间的历史演进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内部与外部”的张力结构。以现代大历史观视之,明清以降,先是西方天主教、新教逐步渗入中国社会,后则是列强侵华和中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艰苦岁月,中华传统文化先后经受了西方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面的不断冲击。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随之而来的中西文化冲突,钱穆指出:“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⑥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接受能力以及调和力量。罗素认为,不同文明的接触会促进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中国文化长盛不衰,就在于自身能够调和矛盾化解危机,使冲突各方兼容并包,和合共生。在面对中西之间的文化冲突造成的文化认同危机时,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可以有效化解这一难题。总的来说,“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体现在诸多方面,它既可以引导多元文化相互尊重、相互包容,例如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与风俗,理解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差异,又可以推进多元文化相互吸收彼此的精华,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⑦,还可以促进我们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结合自身发展需求以生成更高的智慧,从而推动人类的文明向更高处演进。中华传统文化是当代社会发展可供借鉴的宝贵历史文化资源,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选择的同时,要坚定文化自信,不断自我批判与创新发展,正如陈寅恪认为的那样,文化的发展一方面接纳外来的学说,另一方面不忘本民族的主体地位。所谓民族的即是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应与全球文化的交汇争鸣中,进一步发挥特质文化的结构张力。

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4页。

②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376页。

③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第117页。

④郭象注;成玄英疏;曹礎基,黄兰发点校:《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35页。

⑤《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77页。

⑥钱穆:《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版,第51页。

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1页。

三、中华传统文化张力的特质:“以人为本”、以德为底色

从历史长河来看,中华传统文化的发生、发展、积淀与传承,是一个不断创造和创新的过程,其内涵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丰富。然而,中华传统文化中“德”的文化底色始终没有改变,反而随着时间的沉淀熠熠闪光。正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底色的特质,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张力内化为发展动力,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实现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意义上的延续。

中华传统文化张力的特质之一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渊源有自,先秦时代《易》就有三才之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①],将人放在天、地之间的中心位置,这表明人的地位非常重要。“以人为本”是以人为核心与目的,比如以陆象山为代表的宋代大儒,一生的追求便是“堂堂正正做人”。他认为“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②]。钱穆说:“中国文化,最简切扼要言之,乃以教人做一好人,即做天地间一完人,为其文化之基本精神者。”[③]钱穆之语准确地概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那就是希圣希贤、成己成物。“以人为本”在政治方面的体现就是“以民为本”。尧舜禹时期便已出现爱民与保民思想,及至周朝,民本思想已成为中国社会重要而成熟的政治理念,《尚书·泰誓》载:“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④]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⑤]又《召诰》:“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⑥]其意为民与天具有同等神圣地位,民意即天意,天子通过民意可知天意,对民的敬畏与关切成为政治思想和一切政治活动的中心。孟子承继孔子“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民本理念,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⑦]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也是汉代贾谊学说的精髓,他在《新书·大政上》首篇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以之为民无不为本也。”[⑧]贾谊对民本思想进行了理性思考,前述意在说明民众是政权稳定的根本,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特质贯穿中华文化。时至今日,“以人为本”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华传统文化张力的另一特质是以德为底色。早在《尚书》就已出现了“克明俊德”“惟德动天”的说法。可见,重“德”是中华文化中的古老观念,而在其后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越来越多出现关于“德”“德行”“德性”的论述,如《诗经·大雅》:“敬慎威仪,以近有德”[⑨],又如《周易·坤卦·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⑩]等等,先哲多将“德”理解为道德、美德,指的是个人的内在美好品质。不仅如此,还对“德”进行了详尽的分类,例如《尚书·洪范》[⑪]篇中有三德:正直、刚克、柔克;《尧典》[⑫]篇中有四德:直、宽、刚、简;《皋陶谟》[⑬]篇中有九德:宽、柔、愿、乱、扰、直、简、刚、强;《中庸》[⑭]中有三

①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第572页。

②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9页。

③钱穆:《人生十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0页。

④王先谦撰,何晋点校:《尚书孔传参正》,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09页。

⑤王先谦撰,何晋点校:《尚书孔传参正》,第510页。

⑥王先谦撰,何晋点校:《尚书孔传参正》,第716页。

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75页。

⑧贾谊撰,阎振义等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38页。

⑨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12页。

⑩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第226页。

⑪王先谦撰,何晋点校:《尚书孔传参正》,第570页。

⑫王先谦撰,何晋点校:《尚书孔传参正》,第135页。

⑬王先谦撰,何晋点校:《尚书孔传参正》,第167—168页。

⑭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页。

德:智、仁、勇;《国语》[①]中有四德:精、忠、孔、信;《周礼》[②]中有六德:知、仁、圣、义、忠、和,这些分类使"德"的涵义更加丰富。徐复观指出周人的"敬天保民"包含了一种早期的人文精神:"周人建立了一个由'敬'所贯注的'敬德''明德'的观念世界,来照察、指导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正是中国人文精神最早的出现。"[③]不难发现,"德"不仅表示个人的内在美好品质,还可表示为某一种具体的价值理念,二者的相同点是均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芒。

其中,"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孔子认为"仁"是最高的道德标准、道德原则和道德境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德性。孔子将各种道德规范归置在仁的范围之内,包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等诸多内容,赋予"仁"丰富的伦理内涵。可以说,孔子之"仁"是一种全德。孟子提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④]的理论命题,认为"仁"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并将仁义视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关键所在。孟子将"仁"作为一种具体的价值取向,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⑤],仁的实质即是孝顺父母。"仁"由孔子时代的全德变化为具体的价值取向,这一变化并非窄化了"仁"的内涵,而是细化了"德"的分类,使之更加具体。除却仁德,还有孝德、悌德、义德等等,这些具体的价值取向无不彰显以德为底色的中华传统文化。

古今中外,人们对"中"这一理念都有强烈的共鸣,"中"代表着不偏不倚的价值取向,是德的体现。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有过度、不及和中间。德性的本性就是恰得中间,德行作为相对于我们的中间性、中道,是一种决定着对行为和情感的选择的质量,受到理性的规定。"[⑥]在中国哲学语境中,"中"多意味着"中庸""中和""中正",均属"德"的范畴。中庸强调的是在生命实践过程中,积极寻求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发展过程中的平衡点。孔子以"中庸"为极致的美德,曾感叹"中庸之为德,民鲜久矣"[⑦]。子思继而以"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⑧]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⑨]来释"中庸",提出"极高明而道中庸"[⑩]的主张,赋予了"中庸"以"中和"的新意。后儒释"中庸"虽有差异,但多将此说作为依据。作为儒家倡导的道德理想,中庸之德对我们中华民族意义重大,因其直接引导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中华传统文化的张力具有两面性,在文化延续、创新、活化过程中,中庸之道发挥着使其张力时刻保持平衡的效用,使中华传统文化实现了从"文化传统"到现代意义上的延续。

以德为底色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潜移默化地铸造了中国人善良、堂堂正正做人的心性。在当代社会生活实践中,社会分工依然受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例如提倡教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⑪]的师德,官员追求"为政以德"[⑫]的官德,医护恪守"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⑬]的医德。以德为底色的传统文化特质铸就了中华民族的仁爱孝悌、克己奉公、诚信友善、勤俭廉政、见义勇为等善良品性,积淀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自强不息、追求和平、勤勉自持、积极创进的伟大民族精神。可

①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2页。
②孙诒让著;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56页。
③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徐复观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75页。
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2页。
⑥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译:《尼各马科伦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91页。
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0页。
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8页。
⑩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6页。
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93页。
⑫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3页。
⑬林逋等:《省心录(外三种)》,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0页。

以说,以德立身、以德兴邦的理念早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气韵,为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与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四、余论

中华传统文化的张力耕植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整体性与开放性,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弹性结构,表现为“统一与多样”“核心与边缘”“内部与外部”的辩证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以“以人为本”、以德为底色的张力特质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厚植文化自信、守正创新中华文明、引领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有效历史文化资源。中华传统文化的张力既可以内化为动力,推动文化自身新发展、新飞跃,又有可能使其自身陷入困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把握“两个结合”,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因此,如何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张力进行正确引导和运用,依然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对于中华传统文化要有清醒认识和理论自觉。地缘优势、历史传统、文明互鉴、多民族等因素共同成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这就要求我们辩证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关注传统文化自身的张力问题,厘清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特质和特殊价值,整体性、多角度地审视、反思、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热的背后同样需要冷思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充分肯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形成理论自觉。其次,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时代诠释。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谓的“传统”并非是静态的、永恒不变的,而是“变化日新”“与时俱进”的,我们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看待中华传统文化更新,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以增强其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语境中自主发展的能力,赋予中华传统文化符合时代的新内涵与表现形式。最后,把握中华传统文化“两创”契机和精准定位。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已进入关键时期,把握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引下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命题。面对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性,让中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谱写新的历史华章。

[责任编辑:李　炜]